

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

— 赵瑶丹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

— 赵瑶丹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赵瑶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6935-3

I. ①两… II. ①赵…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63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501 千字
定 价 10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博士生课题“谣谚与宋代社会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0CGLS02ZB）。

本书受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序

我国的谣谚源远流长，既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又对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能动的促进效应；既是文学、民俗学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一个王朝的诞生或覆灭，或多或少总有谣谚伴随之。赵宋王朝也不能例外。谣谚的产生和流传，与创作它的社会群体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利益诉求：或是他们对社会的真切认识，或是对社会、对某一人物的褒贬态度，憎恶喜爱，冷嘲热讽，无不寓意深刻。他们中有平民百姓、官僚士大夫，也有上层统治者，甚至有居心叵测的社会敌对分子。他们用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和真情实感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谣谚。这些谣谚真实地表达了民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信息。例如五代后周末年流传的谣谶“点检作天子”，其产生和传播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这一谣谶是在总结了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53年历史而制作出来的一种预言。这53年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因军事实权演绎的历史。当时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有实力黄袍加身，屡试不爽，这已成为当时历史演进的惯例。《江行杂录》载宋太祖为殿前点检，将北征，“京师民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作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独宫中不知。太祖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决诸胸中，乃来家恐怖妇女何为？’”就赵匡胤而言，即使最初可能并无想做皇帝的野心，但他身边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以应“点检作天子”之谣谶。其时新即位的周恭帝才7岁，“主少国疑”，政局不稳，谣谶“点检作天子”的产生与传播，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识。这种谣谶作为谣谚的特殊表现形式，不失为一种舆论武器，

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引发重大政治事件，乃至政权更替。谣谚要想成为具有预示性的谣讖，需要创作者准确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把握政局动向，仔细分析社会形势、各种政治集团的强弱以及人心向背，再运用谣谚的创作技巧加以整合而成。

唐宋之际，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瓦解，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界限不再像以往社会那样不可逾越。大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城市坊市制的消失，庶族地主的成长壮大，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不仅为租佃制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证，也为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此城乡之间的交流加强，人口流动加快，使得社会信息传递加速，从而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谣谚传播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宋代实施右文抑武政策，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较为宽松的舆论和文化氛围。宋代大力兴办学校，普及文化教育，使原来的雅文化逐渐走向俗文化。科举规模的扩大，造就了大批文化人，文人阶层的扩大与流动，给谣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影响着谣谚传播诸要素的互动，促进了宋代谣谚的繁荣，两宋谣谚的内容、内涵、呈现状态、表现方式等均一一走向成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相对于汉代讖谣浓重的宗教色彩，宋代的谣谚更趋向世俗化，诙谐、调侃、戏谑特色替代了早先谣谚的凝重、严肃和神秘。谣谚文化也深深影响了两宋社会的历史发展。宋代是中国古代谣谚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宋代的谣谚是我们民族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研究宋代的谣谚，对于研究人类学史、文化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等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学术界目前研究谣谚多从传统的民间文学、语言、民俗研究角度出发，较少将其置于社会史视域加以探讨。赵瑶丹的《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则在这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尝试，是一部主要以社会史为视角的谣谚研究力作。赵瑶丹将谣谚纳入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站在唐宋变革的时代高度来探讨谣谚的社会效应及其特征，把谣谚放到纵横交错的社会历史坐标中进行观察，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通过对谣谚的载体、谣谚的创作者、谣谚产生与传播的原因、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的探究，进而揭示谣谚与两宋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沙里淘金，搜集挖掘出一个个谣谚实例，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加以深入透析和解读，探其发生源流，述其社会功能和社会文化价值。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互证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除了文学形式的分析，

也融入了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跨越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学的学科界限而做了新的探索。这一研究成果有高度、有理论、有史实，论述严谨，用细腻的笔触全方位地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宋代谣谚的方方面面。通过宋代谣谚与宋代社会互为依存、互为促动这一视角的探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谣谚文化领域的研究。

赵瑶丹这部书的写作基础是在浙江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时打下的，从选题到查找资料，方如金先生给予了细心指导。进入上海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后，她对谣谚课题的研究兴趣并未衰减，仍孜孜不倦进行探索，徜徉于书海之间，并把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继续勤奋耕耘。经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毕业以后，又陆陆续续进行了补充修改。这部书写作至今，前后已历十年，可谓十年磨一剑。赵瑶丹给我们打开的是一幅蕴含丰富社会信息的文化长卷。阅读这幅长卷，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宋人的喜怒哀乐，体会到他们的生活态度，领略他们的智慧和幽默，感触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

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社会文化史佳作。当此出版之际，我作为指导教师，除了向赵瑶丹表示祝贺外，衷心期盼她在已开拓的学术之路上再接再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断进取，取得新的业绩。

戴建国

目 录

序	(1)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1)
一 谣谚	(1)
二 取材范围	(4)
三 内容与传播	(6)
第二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8)
一 选题缘起	(8)
二 选题意义	(17)
第三节 学术史的回顾	(18)
一 大陆学者的研究	(18)
二 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的研究	(24)
第四节 材料与理论方法	(28)
一 关于材料	(28)
二 关于理论与方法	(29)
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33)

上篇 内容篇

第一章 两宋谣谚的形式	(39)
第一节 谣谚的创作与表现形式	(39)
一 谣谚的创作形式	(39)
二 谣谚的分类及与其他语言文学形式的关系	(43)

三 谣谚的异化	(46)
第二节 谣谚的特殊形式——谣谶	(48)
第二章 两宋谣谚的社会背景	(54)
第一节 两宋谣谚的生发、传播、接受环境	(54)
一 传统的信仰观念	(54)
二 时代文化与舆论环境	(65)
三 发达的城乡经济	(79)
四 多样的传播渠道	(81)
第二节 两宋谣谚产生和传播的原因	(91)
一 两宋谣谚生发的社会背景	(93)
二 影响两宋谣谚传播的因素	(120)
第三章 两宋谣谚中的社会内容	(132)
第一节 两宋谣谚中的政治生活	(132)
一 内外矛盾	(134)
二 政治制度	(150)
三 人物品评	(167)
第二节 两宋谣谚中的社会生活	(186)
一 经济状况、四时生产	(186)
二 地理环境、山河风物	(193)
三 民风民俗、家庭生活	(197)
第三节 两宋谣谚中的文化风貌	(219)
一 谣谚中的科举社会	(219)
二 谣谚中的音乐、书画、词人	(248)
三 谣谚中的伦理观念、宗教信仰	(251)

下篇 传播篇

第四章 两宋谣谚的传播	(273)
第一节 谣谚的传播方式与载体	(273)
一 传播方式	(273)

二 传播载体	(279)
第二节 谣谚的创作、传播及接受	(283)
一 儿童的嬉戏相闻	(286)
二 僧道巫覡的造讖传谣	(292)
三 社会各阶层的引谚谳事	(295)
第三节 文人与谣谚的创作、传播及接受	(302)
一 谣谚创作和传播的重要驱动力:文人	(302)
二 文人对谣谚的吸收影响宋词、曲的创作	(315)
三 文人对谣谚的吸收促使谣谚与诗歌的雅俗互动	(319)
四 文人对谣谚开展学术研究	(323)
五 文人对谣讖的接受与批评	(326)
第五章 两宋谣谚在空间上的传播与分布	(333)
第一节 谣谚的都城传播	(334)
第二节 谣谚的乡村传播与城乡互动	(343)
一 频繁的人口流动推动城乡谣谚传播	(345)
二 节日娱乐为实现城乡谣谚传播提供契机	(351)
三 人口迁移助推谣谚更大范围的传播	(353)
第三节 谣谚的区域传播	(356)
第六章 两宋谣谚在国家事务中的接受与控制	(363)
第一节 两宋谣谚的传播效果	(364)
一 影响国家事务	(366)
二 关乎人物命运的沉浮与转迁	(370)
三 助推政治风波	(375)
四 引导其他社会行为	(378)
第二节 宋廷对谣谚的控制——以禁讖为中心	(383)
一 禁讖的法律规定	(385)
二 两宋君主的信讖行为	(392)
三 国家事务中的应讖举措	(398)
余论	(404)

4 目 录

一 两宋谣谚的社会史内涵	(405)
二 两宋谣谚的特点	(414)
三 两宋谣谚与社会的互动	(419)
主要参考文献	(424)
后记	(450)

绪 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一 谣谚

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段内，谣与谚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来看待，并留下了众多关于谣与谚的不同定义，但因为都含“俗”或“非官方”的特点，在具体运用时并未作严格区分，往往是相互指代的。

谣，习惯性地被称为歌谣。歌与谣本身存在区别，中国古代的口头说唱或吟咏有配乐的便是歌，无乐可合的便是谣。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指出：“一则本意在于合乐，非欲徒歌；一则本意在于徒歌，偶然合乐也。”^①但歌与谣的区分古人并不十分强调，杜文澜还指出：“谣与歌相对，则有徒歌合乐之分，而歌字究系总名；凡单言之，则徒歌亦为歌。故谣可联歌以言之，亦可借歌以称之。”^②

杜文澜对谚的解析很全面，谚“本系彦士之文言，故又能为传世之常言”，“谚之体主典雅”，“谚之用主于流行”。现代学者在前人基础上对谚的定义进行了诸多阐发，如郭绍虞《谚语的研究》指出：“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③又如王毅《略论中国谚语》提出：“谚语是一种口头

①（清）杜文澜：《古谣谚·凡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郭绍虞：《谚语的研究》，原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4号，转引自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创作,产生于民间,流传于人口,本身常包含有一种教训意义,“是某种思想的形象表现,在它里面反映出人民的经验,是他们的处世秘诀。”^①尽管语言学者对谚所下的定义众说纷纭,但这两位学者给出的阐释,现在看来还是很到位的。

从谣与谚的区别来看,谚更具教化意味。正如明代赵宦光言:“观彦言而可以知寓教于文矣。”^②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对谣、谚的语言形式作了比较:“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胜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③除了比较不同点外,杜文澜也谈到因为二者皆为韵语,实际上是相通的,故“合谣谚为一集”。但他特别强调“韵语”,认为“无韵之词,与谚无涉”,这就难免使许多文字简练的谚语,因为不是韵语而在《古谣谚》收集时落选。《二十五史谣谚通检·编例》指出,本通检所收之谣,包括歌与谣两类。所谓歌,仅限于即兴之口歌,即古人所云“徒歌”。所谓谣,有时谣、童谣、地方谣等。所收之谚,包括谚与时语两类,古人称为“传言”的谚,今人谓之俗语,有古谚、鄙谚、地方谚等;时语,史书常以“时人为之语”“军中为之语”“京师为之语”等形式标示。昔日之时语,今悉视为谚,与“传言”性质相同。^④这样就将杜文澜界定的“谣谚”含义扩大了,可以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俗语的范畴,同时亦符合古代社会“谣谚”内涵的实际。对于社会史研究而言,这一还原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俗语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记载,以“谚”“鄙谚”“鄙语”“野语”“民语”“言”等代称。俗语作为术语,如果以刘向《说苑·贵德》的记述作为起点,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代学者屈朴指出,在语言学家看来,俗语是汉民族语言中的特殊语言材料;在民俗学家看来,俗语是民族民间

① 王毅:《略论中国谚语》,原载《民间文学》1961年10月号,转引自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第127页。

② (明)赵宦光:《说文长笺》卷14《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95册,第390页。

③ (清)杜文澜:《古谣谚·凡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④ 尚恒元、彭善俊编:《二十五史谣谚通检·编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文化中的口头语言艺术，是民间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集民间语言材料与民间文学于一体；在语言人类学家和民俗语言学家看来，俗语是民间文化的一种主要载体和艺术形式，即民俗语言。^①应该指出的是，其论述忽视了一点，从历史学科的角度出发，特定时代的俗语保存了丰富的时代信息，是天然的史料。正因俗语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俗语为观察社会的视角，成为本书的基本出发点。

随着时代推移，涉及俗语研究的著作越来越多，但主要围绕辑录资料、探求语源等方面展开，对于什么是俗语的界定亦众说纷纭，总体而言，偏重“俗”而忽视“语”，且呈现凡是带“俗”风格的词、语常被列为俗语的倾向。“谚，俗言也”“谚，俗所传言也”等说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学者对俗语的最初认识。从古人的引述中可见，对俗语的理解存在近同于谚语、歇后语、成语^②、方言词或一般语词等多种倾向。^③俗语和“常言”“常谈”“恒言”“乡言”“里语”“俗言”“迕言”“俗谈”“俚语”“俚谚”“里谚”“俗谚”“直言”“鄙语”等常互为通用，从而成为异名同体的术语。值得注意的是，歌谣也常以“里语”“俚语”“俚谚”“里谚”“俗谚”“鄙语”等来代称。另外，亦有以“风”代称民谣，“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④。也就是说，俗语在一定意义上是谣谚俚语的泛称，在使用时具有随意性。故本书取俗语近于谚语之意，排除其所指的歇后语、成语、方言词、一般语词的指代义，将俗语列入考察的范围。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虽然“谣”属于文学作品，“谚”和“俗语”属

① 屈朴：《俗语古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② 《恒言录》在“俗语”条下称，“俗语多出於释氏语录”，“宋儒语录亦多用俗语”。所举例子有“瓦罐不离井上破”，系谚语；有“鲍老送灯台”等，系歇后语；有“弄巧成拙”“抛砖引玉”等，系成语。

③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6页）记载：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次提到俗语，多偏向于方言之意，如五笔卷1《俗语有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6页）、卷3《俗语有所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页）、五笔卷6《俗语放钱》（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00页）、续笔卷7《俗语算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0—301页）等。

④ （宋）朱熹：《晦庵集》卷50《关雎疑周公所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4册，第478页上。

于语汇，性质上不同，但是因为具有很多共通性，把“谣”“谚”“俗语”编在一起，显然便于展开论述；而且，古人对“谣”“谚”“俗语”的内涵并未严格区分，具体运用时常以此代彼，将歌谣、谚语、俗语等回归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作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更是无可非议。故本书选材时取谣、谚的内涵和外延，以“谣谚”作为标识，统称为谣谚研究。

二 取材范围

本书将研究的时段定位在宋代，那么反映两宋社会内容之谣谚的选材问题必须加以说明。有的谣谚是前代流传下来，被宋人记载、引用以反映两宋社会；有的谣谚是宋人创作，流传于一时；还有的是宋人创作，但未见于宋代文献却见于后代的史书或其他文字材料中。由于谣谚本身以及创作、流传、记载的特殊性，故本书以反映两宋社会为选材的根本出发点，所选谣谚以宋代创作的为主，包括在宋人的著作中予以引用、记录，也包括前人创作，在宋代或经过改编，或加以引用，同时包括后人记录的反映两宋社会的谣谚。

“俗语植根于群众，书面文献里的俗语虽然不是源，也不是作者个人的创造，然而作者对流传在群众口语中的俗语的引用或记载，因此，从历代的典籍里往往可以看出俗语的流变，从而为俗语的断代研究提供资料，对于深化俗语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①此观点固然是侧重强调从文献记载看俗语流变，从而为俗语断代研究提供线索，而断代的俗语却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从而为断代史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史料。逝去的历史已经无法复述，留下的只是书面文献的记载，故本书所引的谣谚主要来自宋人及后人的文献典籍。

“谚中杂谣杂谐，……谣而杂于谚也。……谐而杂于谚也。谣中杂讖，……讖而杂于谣也。”^②“谣”“谚”“讖”时而夹杂，时而分立，因而谈谣谚文化必定难以避开讖文化。历史上有许多谣谚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其后的一些史实发生某种程度的巧合，因而被人们看作是灵验的讖言，常称

^① 温端政、周荐：《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结语》，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② （明）郭孔太：《书传正误》，转引自《古谣谚》卷100《集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63页。

为“谣谶”^①。进行谣谚与社会历史研究，势必无法回避对谶言（语）这一神秘文化现象的探讨。将谣谶纳入考察范围，梳理其与社会存在的内在联系，分析其生发和繁荣的原因以及在社会历史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以期达到对宋代社会更深入、更丰富、更立体的认识。

《说文·言部》曰：“谶，验也。从言，讠声。”《广雅·释詁四》曰：“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可见“谶”的本义是有效验或应验，且与人的语言有关。汉代学者张衡指出：“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② 谶的一层含义是指讲占验的文书。《四库总目提要·易类六》云：“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由此可见，谶又有另一层含义，即谶言，也称谶语，“其实质是古人假托神意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预言”^③。谶从产生之初就与政治的变革、社会的危机、王朝的兴替紧密相连，从而成为社会稳定和政局动荡与否的晴雨表。

古人常以卜辞的形式对未来的吉凶做出判断和预测，这些预言未来的卜辞应看作是谶言的萌芽，是谶言的滥觞。周秦以降，童谣和民谣（谚）一直是谶言的主要载体。也就是说，谶言往往以童谣或民谣（谚）的形式传播。古人认为，天帝、神灵往往借助童谣或民谣（谚）向人间暗示未来的吉凶祸福。这些被认为预兆人事休咎的童谣或民谣（谚）又常被冠为“诗妖”，在历代史籍中多有记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童谣常被渲染成是荧惑星（火星）降临人间所为^④，构成传统社会历史中的独特景观。

从是否具有预言性的角度观察，可将谣谚分为评述性与预言性两种不同性质类型。前者是事后总结，或褒扬或鞭挞，或叙述或评论，往往与事实相符；后者是事前根据情势做出的观测，有的应验了，从而与史实吻合，有的并未应验，从而不能作为史实的直接论据。以民谣为材料来认识社会历史，需要非常审慎地取舍和甄别。民众观察、感悟生活、社会，是无意的记录与抒发，并非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会在他们的印象中留下痕迹。单条民谣民谚的内容含量以及容纳度有限，加之在传播、记录过程

①（明）郭孔太在《书传正误》（转引自《古谣谚》卷100《集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63页）中对谣谶的解释是：“谣中杂谶，如《论语比考谶》、天监志公诗谶、陆法和书谶，谶而杂于谣也。”谣谶即谣中杂谶，或称谶谣，谶中杂谣。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9《张衡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12页。

③ 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④ 同上书，第9页。

中又经过多次取舍。民谣民谚又掺杂着附会之说，验证其真实与否存有困难。因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史料而言，存有缺憾；但这恰恰又为我们深入探讨产生这些缺憾的社会因素提供了广阔空间，为揭示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契机。

三 内容与传播

本书将从内容与传播两个层面，对两宋谣谚与社会展开研究。

在内容部分，亦涉及形式的探讨。谣谚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如果从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去观察这一文艺分支，那么可以说正是因为谣谚在客观方面呈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一致，既有赏析价值，又有认识价值，所以才得以在一时或长期留存。谣谚内容广泛，具有深沉的内涵和无穷的意趣，往往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智慧，是社会历史、时代风貌、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谣谚的形式整齐而流利，语句警拔，读来朗朗上口，历来为民众所传唱，并乐于传唱。正如清代刘毓松在《古谣谚·序》中指出：“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惟夫童谣舆诵及田家杂占，未尝师法古人，出于天地自然之音。世治之汙隆，人材之邪正，莫不一本好恶之公。”^①显然，谣谚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就其本身所反映的内容而言又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正如郭沫若在《我们研究民间文艺论文选》一文中提到，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从一定意义上讲，谣谚所展示的历史信息比“正史”更真实可靠，更生动活泼，更切实逼真。

而就谣谚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及其体现的价值孰重孰轻的问题，本书想借一段分析民间文学的材料加以说明。“民间文学之所以吸引人，绝不是单纯语言的文学形式，而是以‘民俗’作为载体的生活实现，其关心的不是‘文学’，而是‘民俗’，即不是为‘文学’而创作的，而是为‘民俗’创作的，是民众心理与行为的集体积淀，直接诉诸民俗的生活美感，经由不断的再传播与再接受，深入民俗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情境。民间文学的价值，其民俗内容应该比文学形式更为重要，表达了民俗共有的知识水

^①（清）朱彝尊辑录：《明诗综》卷100《杂谣歌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59页。